

论清一代关于疆土版图观念的嬗变*

邹逸麟

能强乎?”^①

然康熙以来,西北尚有强大的准噶尔部未入版图,其所控地跨葱岭东西、天山南北,东抵哈密,西及中亚,疆土之广,不下于中原;又勾结沙俄,覬觐中华。后由康、雍、乾三朝,经历大小多次战役,历时数十余年,终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四年先后征服准噶尔和平定天山南路大小和卓木,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西北疆域收入版图。同时顺、康年间先后册封达赖、班禅额尔德尼,赐以册印。后又击退准噶尔入藏军,西藏遂入版图。清王朝的疆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辽阔的范围。史称:“自兹以来,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②

我国历史上疆域的变迁,实与所处地理环境有关。我国地处亚洲的东部,北面是蒙古高原的茫茫大漠,向东延伸为外兴安岭,西北为阿尔泰山,西面为帕米尔高原,西南为青

*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清代地理专题研究”(08JJD770112)资助。

本文曾是2008年10月在日本关西大学召开的“西学东渐と东アジアにおける近代学術の形成”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讲演,后发表于其会刊上。周振鹤教授嘱作补充修改,发表于此。

① 《雍正起居注》雍正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中华书局影印,第四册,2910页。

② 《清史稿》卷54《地理志一》。

一、清代大一统疆域的形成

17世纪中叶,统治了中国276年的明朝,为兴起于辽东女真族所建立的清朝所灭,中华帝国的疆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清代统一疆域的形成,有一个相当曲折和漫长的历史过程。从1583年明辽东建州女真努尔哈赤发难,先统一了东北女真诸部,后又占据了明代辽东都司故地,1644年进山海关,1683年平定台湾,据有明朝全部故土,前后整整花了10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清朝对蒙古地区推行“远交近攻”之策,以“厚赏”、“联姻”并杂以武力方式,完成了对漠南蒙古诸部的统一。1688年漠北外喀尔喀蒙古举旗投清,外蒙古进入版图。中国历史上除了蒙元朝,蒙古高原从未真正与中原王朝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内外蒙古进入清朝版图,确为旷古未有之盛事。其后雍正帝论及国家统一时指出:“历代以来,各蒙古自为雄长,亦互相战争。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统,历前明二百余年,我太祖皇帝开基东土,遐迩率服,而各蒙古又复望风归顺,咸禀正朔,以迄于今。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氏,而塞外之一统始于元代,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然各蒙古之所以统一者,亦皆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

到桀,为商汤所灭。

[154] 殷:朝代名,也称殷商、商殷,都城多次迁移,传到纣,为周武王所灭。

[155] 周:朝代名,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立,史称西周;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前256年为秦所灭。

[156] 程邈:字符岑,陕西下杜(今陕西西安市南)人,相传秦始皇时因罪下狱,简化文字,始创隶书。

[157] 云阳:县名,汉魏治今陕西淳化西北。

[158] 青州:汉晋治临淄,东晋后治东阳城(今山东青州市)。

[159] 临淄:今山东淄博市淄川区淄城镇。

[160] 齐太公:即吕尚,姜姓,名望,辅佐周武王灭商有功,封于齐,为齐国始祖。

[161] 典论:三国魏文帝曹丕撰,已散佚,今《文选》收有《典论论文》一篇。

[162] 汉顺帝:115—144年,东汉皇帝,126—144年在位。

[163] 晋辟雍行礼碑:今存《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咸宁四年(278年)立,皇太子即惠帝,是皇帝、皇太子亲临辟雍,参加乡射大礼的纪念碑,乡射是古代的一种礼节,碑1931年出土。注作太始二年立,今碑有泰始三年十月始行乡射礼之语,则“二”当作“三”,当另是一碑。又郾注最后成书时间约在正光四年(523年)前,却未记咸宁四年碑,疑今碑当时因经历战火,可能是西晋末永嘉之乱,碑已埋在瓦砾堆中,故郾道元没有看到。

[164] 青阳门:汉魏洛阳城东垣北起第三门,故址在今偃师市西南龙虎滩东,南滨洛河。

主要参考文献:

《汉魏洛阳故城研究》,洛阳市文物局、洛阳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科学出版社2000年。

《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洛阳文物局,科学出版社2001年。

藏高原,东部和东南部面临大海。在这样四周封闭的地理环境下,决定了我国历史上疆域的拓展、内缩,基本上在这个范围之内。同时,由于地域辽阔(东西跨 62 经度,南北跨 50 纬度),不同的气候和地貌条件,在此范围内形成了东亚季风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等三大自然地理区。这三大自然区内的先民们,根据自身所处的特定地理环境,逐渐形成了从事农耕、畜牧、采集和狩猎等三大经济区。在大漠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东亚季风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社会,从商周以降,农业生产逐渐占主要地位,到了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国家疆域的形成,基本上包含了所有农耕区。换言之,我国最早统一国家疆域的形成是建立在同一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所以秦汉以后,历代汉族王朝的疆域概念,主要是指其统治下的农耕区,以后中原王朝疆域的伸缩变化,主要是与北部干旱和半干旱区游牧民族(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和人口、物资而发生的。八、九世纪以后,原处于比较落后高寒区的狩猎、采集经济的民族,逐渐发展为以游耕、狩猎为主,政治上也出现了部落联盟或国家政权的形式(渤海、女真、吐蕃),于是开始与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发生了土地、资源和人口的争夺。概言之,清代中叶以前我国历史上疆域变化,实质上是由三大自然区决定的三大经济区之间的交融与争斗的表现。

清代前期统一帝国的形成,是将两三千年来,形成的农耕、畜牧、狩猎采集三大经济区融合在一个政权之内,是三大经济区的民族在长期相互交流、融合的自然结果。此后对三大经济区的协调,完全可以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从而大大减少了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性,为各经济区的发展,人民生活

的安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清代以前传统的疆土、版图观念述略

疆土、版图,是现代国家的空间特征。不存在没有明确版图、疆土的国家。但是在我国两三千年的传统社会里,由于上文所述,我国处于这样一个封闭的地理环境内,只有中国是最强大的政权。因此,在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者心目中,认为他们所统治的核心地区即所谓“九州”,为天下之中。“九州”之外有甸、侯、绥、要、荒等五服,五服之外,为四海,即蛮夷之地。在以农耕为本的古人心目中,其直接统治农耕区是为中国本土,其周围四夷均为臣属之地,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①宋人石介《中国论》代表了典型的传统中国疆土观,他说:“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②又如,中国传统社会里,将农业文明和儒家文化地区视为本土,而此外则视为化外之地。帝国的君主认为只要这些化外的“蛮夷”恭顺臣服,按时纳贡,为中国守四方,就无须有明确的边界线。所谓:“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临,无有远迹,一视同仁,故中国莫安,四夷所得,非有意于臣服之也。”^③王夫之《读通

①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所以后人发挥为“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则诸蕃虽地有远近,情有逆顺,正朔有及不及,而凡我行人辙迹曾至者,皆因事备书,以昭国家一统之盛。”(《殊域周咨录》卷 1)

② 载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华书局 1984 年,第 116 页。

③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 4《琉球》,余思黎点校本,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125 页。

鉴论》中明确表示:“语曰:明王有道,守在四夷。制治保邦之道至矣。”^①古代王朝所谓守御疆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好所统治的农耕区。如遇北部强大游牧部落时,守护好本土农耕区,即为守好疆土。汉文帝给匈奴单于的信说:“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②是最典型以农耕区为本土的观念。如逢周边无强大劲敌时,则视周边的少数民族为臣服的四夷,四夷的经济、文化远落后于中原,只是臣服朝贡关系,无须有明确的界域,因此当时没有明确的国界线的概念。虽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唐蕃、宋辽、宋金的划界,但实际只是一种临时的军事分界线,在没有对立民族或政权的边区,就没有产生过这种界线。因此这种界线与现代国家的边界线含义不同。

今天大家公认的代表国家疆域领土的“版图”一词,在我国传统社会里主要指中央王朝派官直接控制和治理的人口和土地。《周礼·夏官·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岛之国,使同贯利。”《清史稿》卷 283《何国宗传》论曰:“国家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版,即版籍,人口统计簿籍;图即所据有土地的地图。我国数千年传统社会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土地和人口(劳力),就是国家统治的基础。所以“版图”一词,就是指王朝直接派官治理,所控制的人口和土地,据此按规定征纳赋税和劳(兵)役。但在我国数千年传统社会里,中央王朝所统治领土内的情况非常复杂,有的是朝廷直接控制的人口和土地,有的则是通过边区少数民族首领控制的羁縻地区。因此,历史文献

中所谓“版图”,往往包含上述两层意思,没有严格限定为今日国家版图的含义。在统治集团的心目中,前一种含义才是他们最为关注的“版图”。例如,汉武帝西逐匈奴,控制了西域之地,置有西域都护府,但在《汉书·地理志》里只记农耕区的 103 郡国。唐朝盛时,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均已内属,在其地置羁縻都督府州,以其部落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③就是对中原农耕地区以外周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羁縻的统治方式,不纳赋税,不服劳役,与内地农耕区不同。到了明代,“即使在中国的统治已经推到长城以外,并设置戍军以支持的时候,其目的也是不对外发展,而是一种防御性占领,以填充可能被用来攻击中国边界的缺口。”^④

三、清一代疆土、版图理念的嬗变

清代康、雍、乾三朝大一统帝国疆域的最后形成,使清代统治者面对的是空前辽阔的疆域,扩大了边疆的视野。历史上中原王朝的北边长城已经失去了国防的意义,不过是一条天然农牧分界线而已。康熙三十年(1691 年)玄烨巡幸喀尔喀蒙古地时,踌躇满志地对扈从诸臣说:“昔秦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⑤由此可见,清代前期统治者

① 中华书局 1975 年,上册,第 26 页。

② 《汉书》卷 94 上《匈奴传》。

③ 《新唐书》卷 43 下《地理志七下》羁縻州。

④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241 页。

⑤ 《清圣祖实录》卷 151,康熙三十年四月壬辰,“谕扈从诸臣曰:昔秦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对疆土视野已超过了以往历朝历代。但是数千年来形成“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的观念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这可以从清代统治者对其领土的管理和对“版图”的观念中反映出来。

清廷统一以后，对辖下广大领土的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和行政体制，大体上分为三种类型：（一）直省，即内地十八省，为明代故土，是传统的农耕区，清初仍沿明制，采取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制度，不过改南京为江南，初为十五省，后有所析置。至乾隆中叶定为内地十八省（直隶、江苏、安徽、山西、山东、陕西、甘肃、河南、江西、浙江、四川、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成为定制。（二）藩部。指边疆部落地区，包括极东北大小安岭地区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原始狩猎部落，清代泛称“打牲部落”，还有内外蒙古、回部和西藏等地，属中央理藩院管辖。范围东自黑龙江、松花江，北尽喀尔喀，南以长城为界，西北包括整个新疆和青藏高原，西南直至川滇边区^①。各地区的统治模式虽有所不同，但都是清王朝的直属领土^②。（三）满洲发祥地东北地区，采取以军政为主、州县为辅的特别行政体制。由于清代疆域空前广大，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自然条件的差异很大。清王朝采取不同行政统治方法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清政权是从一个相对落后的游牧、狩猎民族，经过一百多年的锤炼，最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农耕、游牧、采集狩猎三个不同地区、民族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的庞大帝国，面对的是全新的政治局面，对帝国的统治者来说，一方面是要以新的理念来统治辽阔的疆土，一方面还没有完全脱离中国固有传统的国家理念，因此对现代国家政治意义上的疆土、疆域、领土、版图等概念的理解，

开始是很不清楚的，甚至是模糊的。

例如藩部各地，在清一代大部分时间属崇德三年（1638年）成立的中央理藩院管辖，但理藩院还统辖外藩属国，如俄罗斯事务亦由理藩院柔远司管理，当时清廷也将俄罗斯视为“北蕃”^③，这里就有中外分别不清之弊，这种模糊的中外关系，实出于清人对藩部的看法还是传统的“王者守四夷”观念^④，对周边四夷主要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旷然更始而不惊，靡然向风而自化”^⑤。还离不开传统的文化疆域的概念。直至咸丰十年（1860年）理藩院掌管的外交事务，才划归总理衙门管理。

如对“版图”一词，清初观念仍旧。如清初入关占有明朝故土，概谓之“新入版图”^⑥，并谓“目今广舆大势，渐次尽入版图”^⑦。但

① 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

② 详见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第四章藩部政治体制构造的基本原则与行政模式（一）、第五章藩部政治体制构造的基本原则与行政模式（二）。

③ 龚自珍《主客司述略》：“我朝藩服分二类：其朝贡之事，有隶理藩院者，有隶主客司者。其隶理藩院者，蒙古五十一旗，喀尔喀八十二旗，以及西藏、青海，西藏所隶之廓尔喀是也。隶主客司者，曰朝鲜，曰越南，曰南掌，曰缅甸，曰苏禄，曰暹罗，曰荷兰，曰琉球，曰西洋诸国。……自朝鲜以至琉球，贡有额有朝，朝有期；西洋诸国，贡无定额，无定期。”（《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18页）

④ （清）昭槁《啸亭杂录》卷10《理藩院》：“北人，自秦汉后匈奴、突厥逐雄其部，汉唐主不能与抗，乃至和亲纳币，含垢忍辱，以求旦夕之安，而寇警边烽，又环然至矣。至若本朝，威德伟然，毡庐月窟之长，无不匍匐庭除，争为臣仆。故列圣土封之，世为畀守，作我藩服，朝聘宴享，比隆三代，王者守四夷如是也。岂汉唐孱弱之主所能及也。”（何英芳点校本，中华书局1980年，336页。）

⑤ 李兆洛：《皇朝藩部要略》序。

⑥ 《清世祖实录》卷17，顺治二年六月己卯：“江南既入版图，天下一统。”

⑦ 《清世祖实录》卷34，顺治四年十月戊子。

又有将原已进入中央王朝统治领域内的少数民族首领管理的土司地区，在改土归流后，才说成是“新入版图”，同时在清代还进一步强调对新进入版图的少数民族进行儒家文化的教育^①。所以当时内外之分，主要是指是否属于农耕文明和儒家文化圈，如云南、广西明明是边疆地区，却被说成是内地十八省。可见当时所谓“版图”，实质就是指王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能直接控制的地区，并非专指其所统治的所有疆土。

又如，专指今新疆地区的“新疆”一词，出现于乾隆平定天山南北以后，当时尚未成为正式固定的政区名称，有时或称西域、有时专指天山以南回部。正式成为政区名，实在新疆建省以后。但在此前，“新疆”一词在康、雍年间已经出现，并非指今新疆，而是对贵州、云南、湖南、四川等改土归流后的地区称“新疆”，如《清实录》中有“东川、普洱等处半系新疆”，贵州的“古州新疆”，湖南“苗疆如辰州府属之干州、凤凰、永绥三厅……宝庆府之长安厅，俱系新疆”，“两金川荡平，新疆事件悉由松茂道查办核转。”这些地区清初早已列入版图，为何此时又称新疆？根据史实，实系改土归流后，中央新置官设治的疆土^②。所以清代前期的疆土、版图概念与近代民族国家的疆土、版图概念有所不同。

17世纪中叶以前，欧亚各国尚无明确的“领土”、“边界”的概念，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各国疆域的开拓，相互接触以后，才开始发生边界的交涉。当时代表中国的清帝国，在康熙时，除了西北的准噶尔部以外，周围几乎没有能与清帝国抗衡任何民族或政权。乾隆平定西北后，疆域进一步扩大，自豪地认为“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天朝抚有四海”^③，传统的“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观念，仍占主导地位。但是在以后的年代里，随着国

内外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帝国朝野对版图、疆域、边界等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① 《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己亥：“若二省（指山东、山西）兵民归我版图，则财富有出，国用不匮矣。”《清圣祖实录》卷155，康熙三十一年五月癸酉，“广东广西总督石琳疏言：黎人地方丁田无多，不便设立州县。总兵官吴启爵所奏于黎人地方筑建城垣，添设官兵之处，应无庸议。上曰：闻琼州舆图，周围皆服内州县，而黎人居中，如果此处应取，古人何为将其周围取之，而在内弹丸之地，反而弃而不取乎。不入版图，必有深意。创立州县，建筑城垣，有累百姓。部议不准，良是。”《清世宗实录》卷63，雍正五年十一月戊辰，“云贵总督鄂尔泰疏言：黔省边界生苗，不纳粮赋，不受管辖，随其自便，无所不为，由来已久。……今仰赖圣主声教所讫，莫不愿附版图，但户口必须编造，钱粮自应从轻。且夷名半无姓氏，名字雷同。应行更改姓名，汇册报部，酌为额赋，按年输租，庶几边境长宁，夷民永赖。”同书卷67，雍正六年三月“庚辰，云贵总督鄂尔泰疏报，化导生苗木林工也等一百一十五寨，输诚纳赋，附载版图。”同书卷101，雍正八年十二月庚戌，“四川巡抚宪德疏言：茂州羌民，久列版图，载粮入册，与齐民无异。请照例与汉民一体应试，科举出贡。卷面不必分别汉羌额数，凭文去取，以广乐育鼓励之意。应如所请，从之。”《清高宗实录》卷61，乾隆三年正月乙亥：“命湖北改土归流之县，贡赋悉照原额。……其余改土地方，新人版图者，该督抚现在查勘，分别升科。”同时对新人版图的番民，进行儒家文化教育，参加科举考试。同书卷264，乾隆十一年四月庚午，“番民既入版图，即与编氓无异，应于该寨适中之地，设立讲约所，该州暨儒学等官。朔望轮往，传集番民，宣讲《圣谕广训》，及整饬地方利弊文告。并于律例中，择其易犯之条，翻译讲解，晓谕化导。其子弟秀异可读书者，送州义学肄业。果能渐通文理。照土司苗瑶子弟应试之例，准其考试。”《清高宗实录》卷315，乾隆十三年五月戊申：“至百夷及川广云贵各省土司，今既改置府州或仍设土官，皆隶版图。”《清高宗实录》卷333，乾隆十四年正月戊辰，在平定大小金川前，谕曰：“金川地势，诘屈幽深，其众如鼠伏穴中，师久粮费，民力艰难。上策圣虑，即扫穴犁庭，而地不足以入版图，人不足供赋役，于天朝无所加益。”

② 傅林祥《新疆与旧籍——清代“新疆”一词的含义》，未刊稿。

③ 《清高宗实录》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

这种变化是有内外两方面因素促成的。

内因是：经过康、雍、乾三代的经营，政治上采取高压与怀柔相济的政策，经济上奖励发展农业生产，注意百姓生计，社会相对稳定，边区民族融入统一帝国后，内地与边区的交往日益密切，农耕文化和儒家文明地域的扩大，华夷之限的界线逐渐模糊，边疆、内地“一体化”进程加速，真正意义上大一统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华夷之别，逐渐为中外之别所替代。同时清朝统治阶级因是异族入居中原，务须消除“华夷”之别，以证其统治的合法性。康熙帝即强调：“中外同观，罔有殊别。”^①如针对清初汉族士大夫的华夷观，雍正七年九月谕文武大臣：“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诬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犷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②清王朝自认为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其国家公文多以汉、满、蒙、藏多种文字颁布，即其明证。特别是到了乾隆中期全国疆域的奠定，至少在朝廷高层人员中，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意识已经形成。其时对疆土、版图的认定，已经不限于传统的版和图了。如外蒙归附后，康熙谕曰：“朕承继大统，数十年来，扩从古未入版图之疆宇，服从古未经归附之喀尔喀、厄鲁特等。”^③乾隆时平准噶尔后云：

“现今准噶尔尽入版图，其北则俄罗斯境地。”^④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己丑，谕曰：准噶尔“今既归我版图，即应收其赋税。如有采买，祇当给与平价，不可与外藩交易一例。”^⑤二十四年平回部后，谕曰：“今统计用兵，不越五载，内地初不知有征发之劳，而关门以西，万余里，悉入版图。如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及回部各城，以次抚定。现在巴达克山诸部落，皆知献俘，自效捧檄前驱。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⑥康、雍、乾三朝在蒙古、新疆地区边界上鄂博、卡伦的设置和定期的巡边制度，反映了清代边界意识的加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要求在天津、宁波等港口泊船贸易，乾隆答曰：“天朝疆界分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掺杂。……天朝尺土俱归版图，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⑦这固然是封闭锁国落后政策，但这里明显反映了强烈的国家版图意识。

这一种大一统版图意识，还反映在康、乾、嘉三朝《大清一统志》的修撰。中国有撰写全国总志的传统，至少从隋代开始，反映全国疆域、政区、山川、户口、物产、古迹等等的全国总志已经出现，其目的是为统治者提供疆土情况，以便治理，同时也有炫耀盛世之意。元代以来即名“一统志”。清康熙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于康熙二十五年(1672年)开始编撰《大清一统志》，修志目的，康熙谕《一统志》总裁勒德洪等云：“朕纘

① 《清圣祖实录》卷 151,康熙三十年五月戊子。
② 《清世宗实录》卷 86,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③ 《清圣祖实录》卷 234,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壬午。
④ 《清高宗实录》卷 519,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壬子。
⑤ 《清高宗实录》卷 562,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己丑。
⑥ 《清高宗实录》卷 599,乾隆二十四年十月辛丑。
⑦ 《清高宗实录》卷 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

绍丕基，抚兹方夏，恢我土宇，达于遐方。惟是疆域纷错，幅员辽阔，万里之远，念切堂阶。其间风气群分，民情类别，不有缀录，何以周知？顾由汉以来，方輿地理，作者颇多，详略既殊。今昔互异，爰敕所司，肇开馆局，网罗文献，质订图经，将荟萃成书，以着一代之巨典，名曰大清一统志。特命卿等为总裁官，其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务求采搜博，体例精详。阨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万几之余，朕将亲览。”^①显然是为了炫耀清代疆域之盛。“康熙志”成于乾隆五年(1740年)。这一年十一月甲午，乾隆作序文：“圣祖仁皇帝特合纂全书，以昭大一统之盛大，卷帙繁重，久而未成。世宗宪皇帝御极之初，重加编纂。阅今十有余载，次第告成。自京畿达于四裔，为省十有八，统府州县千六百有奇，外藩属国五十有七，朝贡之国三十有一。……书成，凡三百五十余卷。……书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②乾隆二十九年因新疆内属，又重修《一统志》，“将西域新疆，增入《一统志》”。^③完成于乾隆四十九年。然因其后又有二次平定大小金川之役、两次廓尔喀之役，疆域尚未不稳定。于是嘉庆十六年(1811年)开始第三次纂修《一统志》，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完成，历时34年，数据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断，故定名为《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嘉庆志在边疆统部范围、门类、辖境、边界等方面，大大超过《康熙志》、《乾隆志》，并附有反映全国疆域的“嘉庆大清一统舆图”，其范围“东尽费雅喀，西极葱岭，北界俄罗斯，南至南海。”^④为《康熙志》、《乾隆志》所未有，故“其质量明显高于前二者。学界公认该志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完备、质量最好的一部地理总志。”“所以‘嘉庆志’所辑数据终断之年(1820年)，当是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间坐标。”^⑤

外因是：与西方政治势力和文化接触后，开始加强了自我认同的意识，近代民族国家的意识逐渐产生。这种变化，大体上有几个契机：

(一)中俄《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的签订，大大冲击了传统的疆土观念。原先清廷对北方边疆的疆界并没有十分关注。因为那儿居住的是臣服了多年的打牲部落，按时贡赋，边境安定。17世纪中叶，俄国人开始入侵黑龙江地区，并建立了尼布楚、雅克萨等许多据点，对清朝边境发动了挑战，刺激了清王朝边界概念的生成。但那时内地南明未平、后又有“三藩之乱”(1673—1680)，清廷还无暇顾及北边。1681年平定“三藩”后，开始对黑龙江地区的俄国人采取军事行动，以后经过1685、1686年两次雅克萨战争，大败俄军，但清廷还是希望和平解决边界争端，康熙二十五年(1687年)乘荷兰使团回国之际，委托荷兰使团带信给沙皇，要求“收回雅克萨、尼布潮、罗刹，于何处分立疆界，各毋得逾越，则两界人民，均得安居，不失永相和好之意。”^⑥当1688年以索额图为首的第一次中国谈判使团出发前夕，康熙即指示：“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⑦但是在谈判时，康熙为了求得北边安

① 《清圣祖实录》卷 126,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庚寅。
② 《清高宗实录》卷 131,乾隆五年十一月甲午。
③ 《清高宗实录》卷 722,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朔。
④ 李兆洛《皇朝一统舆地全图·例言》，《养一斋文集》卷 19,引自《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 1 册,321 页。
⑤ 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清史研究》第 16 卷第 1 期,2006 年 3 月。
⑥ 《清圣祖实录》卷 127,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己酉。
⑦ 《清圣祖实录》卷 135,康熙二十七年五月二月癸酉。

宁,在条约上作了让步。同意尼布楚归俄,以额尔古纳河为界。^①这条约在稳定东北部边境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康熙“对于谈判的成功深为快慰”。^②对协助谈判的葡萄牙教士徐日升、法国教士张诚的工作,“觉得事情办得很好,很为满意”^③。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按照国际法的规则与外国订立平等互惠的边界条约,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在《尼布楚条约》里,“清朝”和“中国”已经互称,这时“中国”一词已有近代主权国家的意义。雍正五年(1727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④,确定了中俄中段边界。这两个条约的签订,对清朝统治者传统的边疆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使清朝统治者明白了一国疆土必须有明确的界线,而传统王朝对所辖领土边疆认识的“天下”观,已经完全不适应当代的形势了。于是康熙帝萌发绘制帝国疆域地图的念头,对边境国界格外注意。例如专门勘察和绘制中朝边界图等。^⑤自后清王朝统治者,对国土、边界以及属民的概念,与前发生重大变化。

(二) 16世纪西洋耶稣会传教士在地理大发现背景下,带来的地理学知识,对中国固有的天下、中国、疆土的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晚明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职方外纪》以及清初南怀仁《坤舆全图》的传入,使一部分中国士大夫阶级知道了地球、五大洲,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文明高度的国家,而中国只是亚洲东部的一块,仅占地球的八分之一,终于明白了国与国之间存在的真正区别,抛弃了外国人都归于蛮夷的错误看法。^⑥这就为中国知识界打开了认识世界的大门,令他们开始有了“世界意识”,并刺激他们想了解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包括它的疆域和领土范围。当时西方各国也开始绘制

地图,以证明其国家的领土范围。清王朝康熙帝对西方自然科学很有兴趣,他身边有一批耶稣会传教士,如南怀仁、徐日升、张诚等,康熙即跟随他们学数学、天文学、历学、物理学等,还对地理学更是有兴趣,自谓“朕于地

① 《清圣祖实录》卷140,康熙二十八年三月壬辰,“鄂罗斯遣使臣费要多罗等至尼布潮地方请议分界事宜。上复遣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赴尼布潮就议。索额图奏言:尼布潮、雅克萨既系我属所居地,臣等请如前议以尼布潮为界,此内诸地,皆归我朝。上曰:今年内以尼布潮为界,则鄂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河界。”

② [法]张诚著,陈霞飞译:《张诚日记》(1689年10月12日),商务印书馆1973年,58页。

③ 王立人译:《徐日升神甫的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214页。

④ 《清世宗实录》卷60,雍正五年八月乙巳,与俄罗斯,“以博木、沙毕那岭为界。定界之后,不得混杂居住,……与俄罗斯副使一番一番诺费池等指定东西界址,议立界石。……立定界石。晓谕喀尔喀汗王、各扎萨克、黑龙江将军等,令其约束属人,不得越界生事,违者从重治罪。至恰克图口定为贸易之所”。

⑤ 《清圣祖实录》卷246,康熙五十年四月癸巳,“自古以来,绘舆图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数,以推算地理之远近,故差误者多。朕前特遣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理,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视之。混同江自长白山后流出,由船厂打牲鸟喇向东北流,会于黑龙江入海。此皆系中国地方。鸭绿江自长白山东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凤凰城、朝鲜国义州两间,流入于海。鸭绿江之西北,系中国地方。江之东南,系朝鲜地方。以江为界。土门江自长白山东流出,向东南流入于海。土门江西南,系朝鲜地方,江之东北,系中国地方。亦以江为界。此处俱已明白。但鸭绿江、土门江二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明。前遣部员二人往凤凰城会审朝鲜人李玩枝事,又派出打牲鸟喇总管穆克登同往,伊等请训旨时,朕曾密谕云:尔等去并可查看地方,同朝鲜官沿江而上,如中国所属地方可行,即同朝鲜字在中国地方行;如中国所属地方,有阻隔不通处,尔等俱在朝鲜所属地方行。乘此便至极尽处,详加阅视,务将边界查明来奏。”

⑥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3、45、48页。

理从幼留心”^①。以后由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这种新出现的条约关系必然使康熙帝以往的疆域观念受到极大冲击,从而渴望对清朝的版图有一个新的更全面的了解,耶稣会士在中俄谈判中的突出表现,使得他像信任西方历法一样开始重视而不见他们的制图学”^②。于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正式开始,在耶稣会传教士协助下,于五十七年完成了经过实测经纬度基础上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康熙五十八年二月乙卯诏谕:“《皇舆全览图》,朕费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从来舆图所未有也。……东南东北,皆际海为界,西南西北,直达番回诸部,以至瑶池阿耨绝域之国、黄流黑水发源之地,皆琛赆所宾贡,版舆所隶属。举其土壤,惊为创见之名。溯厥道途,即可按程而至。以六合为疆索,以八方为门户,幅员该广,靡远费届,从来舆图所未有也。”^③当时中国尚未统一,所以康熙图所示疆域,西仅至哈密。雍正十排图,基本上维持康熙图的规模。到了乾隆二十年五月,“西师奏凯,大兵直抵伊犁,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其星辰分野,日月出入,昼夜节气时刻,宜载入时宪书,颁赐正朔。其山川道里,应详细相度,载入《皇舆全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左都御史何国宗,素谙测量,着带同五官正明安图,并同副都统富德、带西洋人二名,前往各该处,测其北极高度,东西偏度,及一切形胜,悉心考订,绘图呈览。所有坤舆全图,及应需仪器,俱着酌量带往。”^④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据新平定西域实测资料,绘制了《皇朝西域图志》,又据此补充修订了《康熙图》,绘制成《乾隆内府舆图》(又称乾隆十三排图)。朱希祖《乾隆十三排图》影印本序云:“乾隆舆图之所以胜于《康熙舆图》者,其精彩全在准部、回部即今新疆省及其迤西小部分是也。”有学者认为:“乾隆《内府舆图》不

仅是一幅历来被认为是奠定了今天疆域版图基础的中国全图,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最完整的亚洲大陆全图,其覆盖面积远远超过《康熙图》。”^⑤但是无论《康熙图》还是《乾隆图》,在两个条约处标有界碑,却都没有标出明确的全部国界。到了《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时所附《皇朝一统舆图》则标出了“盛清疆界:北到外兴安岭,西到帕米尔和后藏的阿里地区,东到库页岛,南到南海。就疆域研究而言,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是近代民族国家的标志性要素中国生成的写照。”“嘉庆图之登场,既是康熙图、乾隆图纂修思想的深化与成果的自然延伸,更意味着中国疆域最终形成的空间最终奠定,而且这空间已非中国传统想象的‘天下’,因为这空间的点、面、线已由清帝国军人、官吏、民众与城池、村镇所填充。换言之,这最终奠定的空间已转变成成为与毗邻国家(或地区)有着清晰界限的领土。所以‘嘉庆图’所标示的盛清疆域与疆界,当是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空间坐标。”^⑥

(三) 清代中叶以来,有两股学术潮流影响了中国士大夫阶层对疆土、版图的认识:一是清中叶开始,延续至晚清的边疆史地之学。

① 《清圣祖实录》卷290,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谕大学士、学士、九卿等,朕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臣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今大兵得藏边外诸蕃悉心归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图,其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当于此时考证明核,庶几可传信于后。”

② 孙喆《康雍乾隆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31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283,康熙五十八年二月乙卯。

④ 《清高宗实录》卷490,乾隆二十年六月癸丑。

⑤ 孙喆《康雍乾隆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62页。

⑥ 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间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梁启超说：“边徼地理学之兴，盖缘满洲崛起东北，入主中原。康乾两朝，用兵西陲，辟地万里。幅员式廓，既感周知之必需，交通频繁，复觉研求之有借。故东自关外三省，北自内外蒙古，西自青海、新疆、卫藏，渐为学者兴味所集，域外地理学之兴，自晚明西土东来，始知‘九州岛之外复有九州岛’。而竺古者犹疑其诞。海禁大开，交涉多故，渐感于彼知己之不可以己，于是谈瀛之客，颇出于士大夫间矣。盖道光中叶以后，地理学之趋向一变，其重心盖由古而今，由内而趋外。”^①这是说清代中叶开海禁以来，开始与西方接触过程中，有感于对自己国家朦胧无知，一部分有识之士对地理学的研究，“由古而今，由内而趋外”。当时不少边疆史地的著作问世，松筠《西招图略》、《西陲总统事略》、洪亮吉《伊犁日记》、祁韵士《新疆识略》、《藩部要略》、徐松《西域水道记》、张穆《蒙古游牧记》、龚自珍《蒙古图志》等等。这些作者“时代相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从而形成了一个边疆史地的学术群体。而“边徼地理之研究，大率由好学之谪臣或流寓发其端。”^②他们原本就有深厚的传统史地学功底，现身处边疆，更关注当地自然和人文，兴起了对国家边疆地区的关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列强势力入侵中华，纷纷视吾为俎上之裔，覬覦其领土而斩割之。从中英《南京条约》，到中日《马关条约》，竟有近二百万平方公里之疆土为列强所割占，为世界史上所罕见。这一系列事件，对中国朝野震动极大，士大夫阶层怀着割地之痛，继续研究边疆史地之热潮，出现大量研究边疆史地的著作，代表作有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东偏纪要》、《东三省舆地图说》等，均为考订边疆史地，以曹廷杰考订“明永宁寺碑”为典型，反映了强烈

保卫边疆，抗拒侵略的愿望和爱国主义精神，这时中国士人中现代国家疆域的概念完全形成。如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建议新疆地区建省，行与内地一样的政区管理，认为此举是“为天朝中外大疆开界处。”^③又在《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中建议在重修乾隆《大清一统志》时，将《西域图志》、《平定罗刹方略》等资料补充进去，以补旧志的不足和遗漏。^④这类边疆内地化的思想，表示了晚清士大夫阶级，对国家疆土近代观念的逐步确立。

二是鸦片战争前夕，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一批西方地理学书籍开始传入东南沿海城市，受到了一批意欲了解中国以外世界的中国士大夫阶级的重视。邹振环认为“道、咸年间，吸收和研究西方地理学的成果来撰写世界地理的著作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风气”，形成了“对于某一组问题的特定研究路线有共同信奉而聚集在一起的学术圈子”，称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 2004 年，346—347 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 2004 年，347 页。

③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我大清肇祖以来，宅长白之山，天以东海界大清最先。世祖入关，尽有唐尧以来南海，东南西北，设行省者十有八，方计二万里。古之有天下者，号称有天下，尚未不能以有一海。……今圣朝既是全有东、南二海，又控制蒙古喀尔喀部落，于北不可谓隘。今中国生齿日益繁，气象日益隘，黄河日益为患，（下述社会矛盾尖锐，建议开发西域，内地向西域移民）……设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准回等处地方总督一员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准回等处地方巡抚一员……（在天山南北路设置府州县，一律按内地之制）……应照内地江宁、荆州例，岁一闾，三岁总督一闾，十，匀请旨派威重大臣来西一大闾。布鲁特、哈萨克之人咸侍，是为天朝中外大疆开界处。”（《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111 页）

④ 《龚自珍全集》第五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312 页。

之为“非体制化共同体。”^①这批士人学者在了解世界地理的同时，对中国传统国家、疆土、版图的观念又掀起一场重大的冲击浪潮。如林则徐组织编译了《四洲志》，以后又有魏源在《四洲志》基础上整理、扩充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的问世。梁启超说：“此两书在今日诚视为刍狗，然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②

徐继畲《瀛环志略》和魏源《海国图志》是我国近代最早向国人介绍西方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海国图志》初版完成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为 50 卷，以后扩充为 60 卷，咸丰二年（1852 年）增补为 100 卷。《瀛环志略》出版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十卷。其实这两部书并非完全是今日概念的世界地理书，实际上还包括世界各国历史沿革、疆域形势、气候物产、风土人情、典章制度等等的史地并重的世界地理著作，其中《海国图志》更是。这两部书的出版，对当时社会起了极大轰动，尤其是在朝野知识界，通过两部著作所绘制的世界各大洲的地图，认识到原来中国传统总认为中国是天下之中，周围全是落后的四夷的观念，以及对国家疆土领域的观念是很落后的。原先“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王者不勤远略，而德意所涵濡，威灵所震慑，类皆有囊括区夏，甄铸埏埴之势”的观念^③，是何等的愚昧和落后！如今看到世界原来有五大洲、四大洋，还有这么多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历史沿革和自然环境与中国如此不同，而中国不过是亚细亚洲东面的一部分，这对长期以来落后封闭的疆土观念，敞开了明亮的窗户。《瀛环志略》卷一首先讲述中国在亚洲之位置，其云：“亚细亚，……居是土者，为中国之十八省、东三省、内外蒙古诸部、新疆、回疆、青海、前后藏。其北际海，为俄罗斯之东境。其东滨海藩国，曰朝鲜。海中三岛，曰

日本。又小岛，曰琉球。其南与中国之滇、粤诸省毗连者，曰安南、暹罗、缅甸、南掌。散布南海之中者，曰南洋群岛。其西北与新疆、回疆毗连者，曰西域诸回部。其西与两藏毗连者，曰廓尔喀，曰五印度。再西为阿富汗、俾路芝、波斯诸回部。再西南为阿剌伯回部。再西北为土耳其之东土。再西为土耳其之中土买诺，所谓小亚细亚者也。北距北冰海，东距大洋海，南距印度海，西距红海、地中海、黑海，是为亚细业之全土。”^④然后又讲中国之版图，《瀛环志略》中的《皇清一统舆地全图》，就是一幅清代疆域图，其对清代疆域的记述云：《瀛环志略》卷 1：“我朝幅员之广，旷古未有。东三省之东北隅，地接俄罗斯。正北之内蒙古诸部，悉其庭幕，编入八旗为臣仆。西南之青海、两藏，置侯尉而安枕。西北之新疆、回疆，包《汉志》西域诸国之大半，而卡外之哈萨克、布鲁特诸部，岁以牲畜供赋役。东海之朝鲜、琉球，南裔之交趾、暹罗、缅甸、南掌、廓尔喀诸国，修贡职无愆期。是亚细亚一土，未奉我正朔者，仅有东海之倭奴，北之俄罗斯，极西之弱小诸回部，南荒之印度诸国耳。则中国之在亚细亚，固不止得其半也。”^⑤有学者认为：“徐继畲最早向中国人士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人类社会，特别是欧美早期近代化国家的社会变革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验教训。这对被隔绝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头一次获得如此详细而真实的海外知识，从而有了认识自己与世界的比较

①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316 页。

②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 2004 年，349 页。

③ 《瀛环志略》道光二十八年福山鹿泽序，宋大川校注本，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第 7 页。

④ 宋大川校注本，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第 8 页。

⑤ 宋大川校注本，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第 2 页。

选择的依据。”^①

魏源《海国图志》编撰的主旨略有不同，其原叙中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予魏源以极大的震动。国家政局的突变，萌发了他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学习西方和“以夷制夷”的思想。《海国图志》就是在这种抗击外夷思想指导下产生的。要让国人睁眼看世界，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善师四夷”，“师夷之长技”，经便“制夷”。故此书对中国周边国家记述尤详，特别重视海防之要，最附有西洋火炮、火轮、水雷及各种军事器艺之说，充满了保卫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引《澳门新闻录》曰：“中国人民，居天下三分之一，生齿之繁，无国可比。即如俄罗斯地方百四十一万四千四百方里，户口不过四千一百九十二万五千名。而中国只湖广一省，广不过十四万四千七百方里，已有户口四千五百零二万名；江南地方九万二千九百方里，户口即有七千二百万名。由此观之，中国只一省，即可抵佛兰西、英吉利、欧罗巴特里阿三国之人民。又《华事夷言》曰：中国繁庶，甲乎四海。但广东一省之人，可敌他方十余国。各国皆地广人稀，即印度户口最稠，亦尚未有旷土。中国则不惟平地皆田，即山巅岭侧，无不层层开垦，寸壤不遗。其散布于海外各国者，尚不知凡几。其繁庶诚四海所未有。由是观之，则东方之宜人，信矣。”^②这种对祖国的自豪感，激发起广大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和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到了晚清，朝野对国家疆土、版图已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周边原为朝贡之国，都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西方列强欲蚕食我国领土，往往挑起边界纠纷，有的公然武装入侵，第二次鸦片

战争后，西方列强强迫清廷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中俄璦琿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英缅甸条约》、《中日马关条约》等等，攫取中国大片领土，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最后虽然均以清朝退让失败告终。然这也强烈激起了中国朝野的民族国家意识，民族国家疆土观念已经完全确立。在边界谈判过程中，对边界的勘查，界碑的设立，地图的绘制，已十分认真，如光绪七年，使英、法大臣曾纪泽与俄交涉，改原由崇厚所订条约，争还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两岸宽二百余里，长四百余里的广大土地，查核地图，重新立碑、设博。^③光绪十二年吴大澂勘查咸丰八年《中俄璦琿条约》琿春与俄国交界地方有界限不清之处，重新立碑、制图。^④在对外交涉中，边疆国土的归属，已有明确的概念。光绪元年云南边境上英使马嘉理被杀一案，地方官员为推卸责任，竟然说此为境外野人所为。奕訢奏曰：“滇省野人虽居铁壁关外，其地尚属中国，不得谓非中国管理，设此案非野人所戕而诱诸野人，或实系野人所戕，而谓野人非王法所及，势必如上年台湾番社一案故事。彼族即派兵，自遂其奸计，大局攸关，实非浅鲜。”^⑤说明晚清官吏对国境边界，已具备了现代意义国界的观念。不仅如此，连在野的士大夫阶级也反映了国土完整的强烈要求。如洋务思想先驱者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中

- ① 刘天纯《徐继畲近代化》载《徐继畲与东西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42页。
- ② 《海国图志》卷74《国地总论上》，岳麓书社1998年，下册，1851页。
- ③ 《曾纪泽遗集》卷5《复陈中俄议界情形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81页。
- ④ 吴大澂《吉林勘界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
- ⑤ 《总署奏英员马嘉理在云南被戕一案与该国使臣续行辩论折》，刊《清季外交史料》第一册，26页。

指出，当时中国“连地广矣，在南则与法之越南、英之缅甸交界，在西则与印度比邻，在东北、西北由东三省、内外蒙古迤迤而至新疆，以在与俄接壤，皆强邻也。”“中国四边，东至库页岛，南至台、琼，西至噶什喀尔，北至外兴安岭，无一不界强邻”^①故强调加强边防之重要。另一位洋务家王韬直接提出《宜索归澳门议》，“首宜索还澳门一隅，归我管辖，画疆置守，设官治民，建炮台，戍兵卒，以固我边圉，用资屏蔽。”又在《送黎侍郎回越南前序》中提出对新疆地区，移民实边，“以固我边陲。”^②在《言战》中提出“中国海疆，南北逶迤万有余里”，宜加强驻军，对海疆的防护。^③此类思想和言论，充分反映晚清进步思想家和学者对祖国疆土完整的意识已完全近代化了。当时晚清国家机构的改革，也适应了这种趋势，如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与西方列强交涉“抚夷局”改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末又改为外务部；边疆地区设置行省的内地、边疆的一体化等等举措，都是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物。又例如“版图”一词，到了晚清则又具有代表现代一个国家国民法定身份意义“国籍”的含义。同治元年协助清王朝镇压太平军的美国人华尔，组织洋枪队，1861年加入中国籍，史称“愿隶中国版图，在上海随同官军。进攻嘉定太仓。”^④以后华尔阵亡，美国人白齐文代之，也于1862年加入中国国籍，后因“白齐文不遵调遣，……该员已隶中国版图，自应遵中国法律治罪，革去三品顶戴。”^⑤这说明“版图”已从传统的书籍和土地含义中游离出来，发展成为国家法定主权的意义了。

四、小 结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完成中华民族国

家的朝代。从康、雍、乾三代三大经济区统一疆域的最后完成，到近代民族国家疆域观念的确立，几乎经历了一个半世纪。这个过程是由内外两种因素互相交织推动的。内因是各民族、各地区经历了长期的交流和融合，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意识自然而然地萌生和形成，最后达成共识；外因是与西方列强势力的接触和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冲击了数千年中国传统的疆土意识，最后不得不放弃封闭落后的“天下观”，融入世界政局的大潮流中去。按理而言，内因是主导因素，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封闭的地理环境而又有传统强势文化的国家，没有外来更强势力量的冲击，其本身自然发展的动力是微弱的、进度是缓慢的。这几乎与中国近代化的过程有同步之感。虽然中国国家意识萌发很早，但由于在亚洲东部最早崛起帝国周围的民族在经济、文化远远落后中华，除了朝贡臣服，没有其他关系。故其疆界观念没有形成的条件。进入清代，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康熙帝又是我国历史上具有科学头脑而又有世界意识的皇帝，因此，《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能对其产生很大的触动。如果遇上一个颀顽昏庸的皇帝，那近代国家疆土观念的萌生，恐怕还要迟上几十年。

19世纪中叶以后，世界的格局已不允许大清帝国仍然沉睡在“天下之中”的美梦中，内外的各种因素不断地刺激和推动着近代国家意识的产生，最后终于产生了具有近代国家意义的中华民国。

- ① 《盛世危言·边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773—774页。
- ② 《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76、202页。
- ③ 《弢园文新编》，三联书店1989年，180页。
- ④ 《清穆宗实录》卷40，同治元年闰八月甲午。
- ⑤ 《清穆宗实录》卷51，同治元年十二月辛巳。